

简论抗战初期武汉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

樊 蕴 珍

自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的1937年底上海、南京失守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通常称之为武汉时期。

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使全国文化界突破了狭隘的门户之见,在一切为了抗战这一共同目标下促成了文化界大团结的新局面。这种大团结的气氛在武汉时期表现最为突出,使沉寂多年的武汉出现了一个抗战文化蓬勃发展的高潮,在整个抗战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①1940年,洛甫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肯定抗战初期文化运动的作用。他说:“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成功及各种文化团体的建立”,“文化走向前线,走向乡村,及文化同大众的结合”,“无疑的是尽了文化支持抗战的伟大任务的”^②。可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武汉时期国统区的抗日文化的功过是非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轰轰烈烈,空空洞洞”,极力贬低它的历史作用,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试图就武汉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谈谈自己看法。

武汉时期抗日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文化统一战线,推动救亡运动的发展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淞沪烽火再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救国旗帜,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从不合法的秘密活动转到合法或半合法的公开斗争。抗日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面临着强大的敌人,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力量尚未完全组织起来。因此,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武器。党在国统区文化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南京失守,国民党政府机关先后迁至武汉,中共中央派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来到武汉,各民主党派、文化团体、文化界名流、演员、歌星以及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荟集于武汉。当时的武汉人才荟萃,成为全国抗战的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

武汉文化运动“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同时以推动这一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为它自己的任务与基本特点”^③。国民党这时转变到比较积极抗战的立场上,采取了一些较开明的措施。1938年初,由陈诚任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恢复了,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这时的三厅实际上成为中共团结各民主党派、广大文化工作者和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为了充实扩大下层统一战线组织,将分散的文化力量迅速组织起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除了派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参加国民党组织的群众团体外,积极筹建新的抗敌文化团

体。据不完全统计,武汉时期建立的抗敌文化团体达100多个。参加团体的成员突破了过去狭小圈子,包括工、农、商、学各个阶层群众。属于全国性的有“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还有戏剧、歌咏、电影、美术、新闻各界抗敌协会有20几个。影响较大的青年组织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青救”组织通过学生的桥梁作用迅速地向青年工人、农民中间发展,其活动范围扩展到湖北省30几个县,波及豫、皖、赣、川等四省,当时有“北有民先,南有青救”之称。又如“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在广大农村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会员分布在50几个县,在农民中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总之,这些抗战文化团体,会聚了一大批热心抗战的力量,他们把祖国利益、民族命运放在第一位,成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打下了良好基础。

抗敌文化团体的建立,推动了武汉救亡运动的发展。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前,武汉救亡运动主要由国民党“后援会”组织领导。自三厅成立后,“后援会”工作陷入停顿,由三厅取而代之。在中共湖北省委密切配合下,三厅先后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在全市开展抗日宣传、游行、集会等群众活动,成功地发动了七七献金运动,仅仅5天时间,武汉三镇献金总额近百万元,购置大量医药、医疗设备及慰问品支援前方;发动征集30万封慰问信活动。三厅的“战地文化服务处”为士兵输送大量抗日宣传品;三厅七处还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缘川英子等进行国际宣传,瓦解敌军,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外援,取得显著成绩。武汉时期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其规模之大、动员群众之广、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极大地振奋了武汉各阶层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武汉会战打响后,工人、学生等响应武汉卫戍总部政治部的动员民众组织战时工作队的号召,有6000工人参加自卫团,60000工人参加运输队和工程队,积极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武汉保卫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坚持时间最久、消耗敌军最多的一次会战,坚持四个月之久,固然是由于前方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但无疑也与后方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得到广大民众支援是分不开的。

二、发展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

毛泽东同志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④武汉时期的文化界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光荣传统,把抗日文化作为反侵略的最锐利的武器;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口号。在这一口号指引下,文化工作者走出亭子间,纷纷深入战地和农村。他们发出誓言,要尽力把一切可歌可泣的壮烈的英雄事迹写出来,战士的枪已使敌人发抖,我们还要用笔去揭露敌人的残暴,去消灭侵略者的灵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努力反映抗战的伟大时代过程中,不仅创造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而且还组织和推动了群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们以报告文学、特写、短诗、独幕剧、街头剧、活报剧、鼓词等形式写出大量为抗战服务的作品,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得到充分发展。它敏捷地反映千变万化的战斗生活,鼓舞群众的战斗精神。如丘东平的报告文学作品报道了淞沪抗战中前线将士和日寇浴血奋战的悲壮生活,控诉敌军的罪行,赞扬了人民和军队的反抗精神^⑤。第二,创作出了许多与时代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好剧目。如田汉的《芦沟桥》、《最后的胜利》,崔嵬等创作的《八百壮士》,洪深的《飞将军》,阳翰笙的《塞上风土》、《前夜》,王莹等创作的《台儿庄》等。与此同时,开始对旧剧种的改造工作,利用人民熟悉的民间艺术形式,宣传抗日内容。为此,由三厅六处处长田

汉任教务长举行了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其中包括平剧、楚剧、汉剧、文明戏、蹦蹦戏以及曲艺等职业工作者700人。讲习班向他们进行抗战教育，让他们了解新的戏剧艺术，运用旧剧种为抗战服务。老舍、张天翼等还求教民间艺人，利用旧形式写作抗战文艺作品^⑥。田汉新编历史剧《新天下第一桥》、《新儿女英雄传》，改编历史剧《渔夫报国》，宣传宋代太守起用豪杰联络渔民大破金兵的故事等，都起到了动员的作用^⑦。第三，群众性的歌咏运动蓬勃发展。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张曙、贺绿汀、刘雪厂、沙梅、林路等组织了武汉三镇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不仅培养一批青年音乐工作者，还创造了许多反映全民奋起抗战的救亡歌曲。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歌词唱道：“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亡国的条件我们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后退，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些雄壮的爱国歌声，鼓舞战士英勇杀敌，激发了大众爱国热情。当时救亡歌曲还有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张曙的《洪波曲》、《赶豺狼》等。第四，全民抗战向中国艺术家提出了建立为抗战而艺术的新课题。美术界走出了象牙之塔，改变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高调，在“艺术不要脱离抗战的群众”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宣传抗日的艺术作品，包括被冷落、摧残的木刻艺术也重新复活。他们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美术画展，揭露敌人的罪行，歌颂军民团结抗战的爱国热情，获得广大观众的赞赏。第五，组织文艺队伍转移，把文艺工作的触角伸展到敌后战区。自徐州失守后，武汉形势日益紧张，为了迅速地将组织起来的文化力量疏散，在周恩来、郭沫若组织和关怀下，组成了10个演剧队、4个宣传队，包括“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七七少年剧团”在内共计130多人，主要向重庆、桂林等地转移。这些剧团成员有的到了延安、苏北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在转移前进行了两周的军事训练和抗日教育，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做到：提高政治认识水平；提高艺术水平；要成为刻苦耐劳坚毅果敢的民族战士；要了解大众苦痛，实现艺术大众化，使文艺成为唤起民众的武器；要团结艺术战线各兵种的力量共同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而奋斗^⑧。武汉各剧种的演员深明大义，几乎全部撤出武汉。担任过三厅戏剧科长的洪深后来回忆说：“那次武汉撤退极为彻底，在戏剧方面讲，留给敌人的完全是空城^⑨。”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也高度评价了组织这次文化队伍转移的意义，他说这支文化队伍转移不仅有利发展国统区文化工作，“给予各战区和后方的安慰鼓励和启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下了乡，受着老百姓的熏陶，使先天带着舶来气质的新文化本身换上了民族气质。”^⑩这支文化队伍在八年抗战中虽然经过艰难万苦，但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文化团体的本色。

关于武汉时期抗日文艺的历史功绩，田汉同志早在1942年的《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中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大的显著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⑪茅盾在1949年的一次文化工作报告中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当抗日战争初起，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剧队，抗宣队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许多短篇和小型的作品，如短篇小说、报告、活报剧、街头剧、墙头诗等。尽管这些作品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但没有人能够抹煞它们在抗战初期所起的宣传作用。特别是抗战歌曲，响遍穷乡僻壤，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⑫这时期的文艺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进行抗战教育，输送抗日人才

为了使教育适应抗战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教育政策，要求迅速“改变教育的旧制

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⑬1937年12月5日，全国莅汉教育文化界以沈钧儒、陈时、杜重远、胡风、李公朴等50人和“抗战教育研究会”等三个文化教育团体联名向国民党当局、教育部以及各学校发出要求立即实施抗战教育的“快邮代电”。电文呼吁“华中已朝夕不保，要挽来此千钧一发之危局，惟有急速发动民众，支持抗战……但要做到这点，全国教育界就非总动员起来，训练民众，培养干部，提高全民族的战斗力不可。”为此，向全国上下提出立即实施抗战教育！对整个教育系统必须根据抗战需要建立为三民主义革命的教育系统；对学校机构，必须改造以适应战时状态；一切学校课程必须减少时间，裁撤无用功课，以民族解放的政治教育为基础，以抗敌的游击战斗为作用，发展抗战的组织教育、技术教育、文艺教育^⑭。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抗战教育研究会”提出了具体实施抗战教育工作大纲，规定战时教育工作原则、工作内容，并建议开办各种训练班、民众学校^⑮。

武汉大学“抗战研究会”于1937年底先后邀请董必武、周恩来同志到武大给师生员工讲演。董必武同志讲演的题目是《群众运动诸问题》，他阐述了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意义，号召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战到底。周恩来同志讲演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指出在伟大的时代，青年运动的性质、任务，号召青年应该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努力去为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斗争到底^⑯。董必武、周恩来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为学生运动和抗战教育指明了方向。

在中共抗战教育政策的指引下，教育工作者走出书房，面向群众，面向抗战，举办各种形式的抗战教育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汤池训练班。它是董必武同志通过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爱国人士石瑛、李范一的关系，在湖北应城汤池创办的合作指导人员训练班。陶铸同志担当实际领导工作。招收武汉失学青年和流亡学生，学习政治、军事、合作业务以及游击战术等课程。每期一个月，结业后分配到农村或部队工作。该训练班开办不足10个月就为抗日战争培养数百名干部。第二，讲演室。“抗战教育研究会”举办起四个讲演室。这些讲演室一般设在工人区的简陋房间里，备有各种抗战图书报刊，定期派人去讲演，他们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述抗战形势、抗战基本知识。工人经过这种抗战启蒙教育，提高了对抗战的认识，从而尽自己的能力自觉参加各种救亡活动。第三，抗战常识研究班。为了适应抗战需要，组织知识青年研究民族解放理论，学习抗战军事技术，学习时间为3个星期。研究班设有：民族解放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军事技术、抗战经济政策以及群众工作方法等课程。聘请董必武、华岗、张仲实等担任教员。第四，阅读与写作函授班。通过这种形式，广大青年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第一期就招收300名城外的学生。每期3个月，只收邮寄费五角到一元钱。学习内容有：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研究；还设有选修课：现代思潮、中国社会问题研究、青年问题、农民问题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等。胡绳、张申府、金中华、沙千里、适夷、艾寒松等同志曾担任函授班的指导教师。与此同时，在工人区举办各种扫盲识字班、工人夜校等。总之，他们把抗战理论与战时知识宣传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短时间内为抗战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同时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与抗战知识，在教育为抗战服务、为民众服务方面做出了成绩。

四、争取民主，反对文化专制

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开展是与人民不断争取人民民主联在一起的。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主做了不少努力。国民党在这期间，抗战比较积极，并给予人民一些言论出

版自由。从抗战开始,出版事业集中到武汉,这时期是出版最繁荣的时期。这期间出版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革命报刊,它们最主要的功绩是宣传了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宣传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阐明的持久抗战的思想,其它抗日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如胡绳主编的《救中国》、徐步主编的《新学识》、丁玲和舒群编的《战地》、薛暮桥编的《中国农村》、白桃编的《抗战教育》以及臧云远主编的《自由中国》等,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00多种。抗日书刊的大量发行,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对民族存亡至为关心的历史责任感和与敌人奋战到底的决心。这些刊物成为战胜强大敌人的重要精神力量。

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害怕民众运动的充分发动,不仅无理地勒令解散“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等很有影响的青年团体,还宣布10几个团体停止活动,竭力限制抗日书刊的发行。为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出版界人士进行争取民主、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

1938年3月,国民党颁布了《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不断发生非法查禁与没收救亡书刊的事件。这种践踏人民出版言论自由的行为,引起了出版界人士与广大读者的愤慨。在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于1938年5月和7月,两次比较集中地揭露和批评国民党当局在各地查禁抗日书刊的行径。《群众》和《新华日报》在5月14日同一天分别发表社论,以示抗议。7月29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编辑吴敏写的《反对查禁救亡书刊》的专论,严正指出国民党当局的行为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规定,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行为。同年7月,国民党又颁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至此,反对查禁书刊的斗争达到了高潮。9月10日,计有中华、开明、新知、黎明、世界、生活等16家书店联合署名,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武汉出版界请求撤销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的文章。该文据理力争,列举不可实行审查原稿办法的八条理由。同一期《群众》还刊登了《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写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问题》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表示对武汉出版界的联合请求给予积极支持,“希望政府对十六家书店的要求加以容纳”该文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列举国民党自抗战以来采取的一些开明政策,来反对它现行的加强文化专制统治的行径^⑦。由于我们党在领导出版界的反查禁斗争中,坚持团结和民主的路线,迫使国民党当局推迟或不能全部都实行它们颁布的检查制度。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思想的影响,在文化工作中也曾出现过缺点或错误。正如周恩来同志指出的:“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⑧表现在宣传工作中曾宣传过“一切为着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等错误观点^⑨。有些文章曾散布过“把武汉的得失看作抗战胜负的关键”。这些失误,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党在国统区文化工作的战斗作用。

综上所述,尽管抗战初期武汉文化运动出现过一些错误,但这只是支流,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国共合作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影响下,广大民众、爱国人士参加的抗日文化斗争,宣传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提高了民族抗战意识,动员组织群众积极支援武汉抗战,进而为开创相持阶段的抗日文化斗争奠定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基础。在这时期培养的一批文化干部,他们后来为发展抗日根据地,开辟大后方及战区的抗日文化,都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注释:

- ①④⑬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3、659、328页。
② 《六大以来》(下册),第787页。
③ 潘梓年:《抗战一年来的文化运动》,载《群众》周刊第2卷第5期,第509页。
⑤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2)第8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⑥ 罗荪:《一段文学历史的回顾》,见1985年8月24日《光明日报》。
⑦⑧⑨ 《洪深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57年版,第142、115、142页。
⑩ 郭沫若:《洪波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
⑪⑫ 王瑶:《中国新文化史稿》(下册),第512页。
⑬⑭ 《抗战教育》1937年12月5日第9期。
⑮⑯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8、197页。
⑰ 《群众》周刊,第2卷,第10期,第575页。
⑱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5页。

(上接127页)

学,有其自己的体系,应概括从原始思维中的哲学萌芽到毛泽东哲学思想诞生的全部中国哲学发展,揭示这一思想历程的内在规律性。然而,在我们目前通用的各种中国哲学史教材中,都只写到“五四”以前的哲学发展,而不提“五四”以后的哲学进程。这样,妨碍了中国哲学史科学体系的严整,特别是将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链条割断了,难以揭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和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使初学者误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不发达。事实上,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哲学运动在中西文化汇合激荡中得到更深入发展、结出更丰硕果实的时期。一方面,中西哲学开始融会成比较成熟的近代哲学诸形态,产生了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人的各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上传播、发展、逐步中国化,诞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代表们和该书主编都认为,在修订该书时,应着重补充关于“五四”以后哲学发展的论述,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科学体系,使学生们较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大家指出,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克服长期以来“左”的错误路线对近代哲学史研究的干扰。有两个问题尤应处理好: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进行深入探讨,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形态进行具体分析,科学地评价其贡献与局限。

代表们一致认为,这部《中国哲学史》既是优秀的科研成果,又是优秀的大学教材。希望经过修订,发扬优点,克服不足,更好地贯彻上述方法论原则,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和中国哲学史教学水平的提高作出新的贡献。